

军旅儿童小说的丰富与突破

——儿童文学作品《兵爸爸兵妈妈》读记

■傅逸尘

小说童心满溢、生趣盎然，主人公小扎西的形象塑造得充满了天真的童趣，作品也随着故事情节的推进展露出人物成长、成熟的轨迹。

二

阅读曾有情长篇小说新作《兵爸爸兵妈妈》(晨光出版社,2023年5月)的过程中,我的脑海里多次浮现出了“小兵张嘎”的形象。老作家徐光耀的中篇小说《小兵张嘎》无疑已成为军旅儿童文学史上的经典,嘎子的形象影响了几代人。但张嘎生活在战争年代,他的思想、思维、性格等,都呈现出鲜明的战争烙印。与之相对,曾有情在《兵爸爸兵妈妈》中创造的人物形象孙可可所处的和平时期,具体说是信息化时代。孙可可与张嘎在形象上的差异当然是巨大的。然而有趣的是,嘎子与孙可可年龄差不多,十岁左右,都是因奶奶之死而走上“报仇”之路,其人生亦由此发生重要转折。张嘎的“报仇”是因为奶奶被日本鬼子杀害,使他开始了艰难而又机智的抗战险途。张嘎既为抗战做出了突出贡献,也在战争中克服了自身的很多缺点,成长为一个英勇无畏又可亲可爱的革命小战士。孙可可的“报仇”,准确地说是“报复”,是由奶奶因病去世而起的。当时,可可的爸爸和妈妈都因执行任务而没能及时赶回家,奶奶因为耽误了救治而故去,爸爸甚至都未能参加奶奶的葬礼。这一变故,对可可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甚至可以说直接改变了他的命运。

可可的爸爸是机械化步兵营的少校营长,妈妈是通信连的上尉连长,可可只有半岁的时候便开始在奶奶的照顾下生活。可可的爸爸和兵妈妈平时任务就很繁重,还经常有突发事件要处理。因此,可可与爸爸妈妈可以说是聚少离多,与奶奶的情感几乎就是他的全部。让可可无法理解和忍受的还有,奶奶去世后,爸爸和妈妈将奶奶的床也搬出了可可的房间。那张床是奶奶留给可可最重要的情感寄托。这种情况用奶奶过去的话讲,“婶可忍,叔不可忍。”由是,可可开始对爸爸和妈妈采取连续的“报复”行动。这个聪明又有“计谋”的孩子,精心设计了一系列恶作剧

行动,给爸爸妈妈增添了不少尴尬和烦恼。兵爸爸和兵妈妈也开始自我反省,他们与儿子的共同烦恼与焦虑也从这里开启了逆转。

或许,人们会用“叛逆期”的心理学术概念对可可的上述行为进行描述与判断。然而,可可出现“叛逆期”的导火索——奶奶的突然过世,却是值得沉思的话题。此前,这个双军人家庭之所以日子还算平静安稳,都是因为奶奶默默地承受和付出。奶奶仿佛就是可可的一座“城堡”,在这里他可以得到想要的一切。奶奶的离去,意味着“城堡”的倒塌,对可可而言,过去所拥有的一切都不复存在。这是可可无论如何都无法接受的。这也是可可“叛逆期”爆发,进而对兵爸爸和兵妈妈展开一系列“报复”的原因所在。然而,兵爸爸和兵妈妈并没有意识到这一问题,他们甚至对可可的“报复”行为感到无法理解,这就导致与儿子的冲突愈演愈烈。

学者诺尔曼·布朗说:“儿童的快乐世界和游戏世界是靠愿望建立起来的,这些未受到现实原则禁止的愿望只能通过非现实的、幻觉式的实现来获得满足。”儿童的所谓“叛逆期”大概与他的梦幻遭遇现实原则的挑战有关,快乐与游戏才是他们生活的逻辑。这一逻辑不可能与现实原则达成妥协,可可的全力反抗也是必然的。奶奶的离世,加之双军人家庭父母长期对孩子的疏忽与冷落,可可的“叛逆”几乎不可避免。如何帮助可可度过这一人生成长中极其重要的阶段,则是摆在兵爸爸和兵妈妈面前的紧迫且重大的难题。

其实,烦恼与焦虑并不仅仅是兵爸爸和兵妈妈要面对的,也是可可无法躲避的。但在这一相互作用中,主导者却是兵爸爸和兵妈妈。他们的思想与行动将决定可可可能否顺利地过“叛逆期”,甚至会影响到可可的未来。这是小说叙事的关键之处,也是曾有情所要着力建构的思想主旨所在。男孩子对英雄的崇拜是普遍现象,兵爸爸和兵妈妈身着戎装共同出席可可的家长会,显然给可可争了光、长了面子。爸爸和妈妈在可可心中的形象也一下子高大起来。他们在学校为师生所作报告中讲述的军人故事,也彻底改变了可可对爸爸妈妈的“敌视”与“对抗”情绪。可可的“叛逆”心理发生逆转,开始敬仰和敬

佩他的兵爸爸和兵妈妈,并进一步向着军人的理想与情怀升华。随后,可可又亲眼目睹了怀孕的妈妈奋不顾身抢救险些遭遇车祸的女孩而流产的惊险一幕。失去日思夜想的“妹妹”让可可几乎痛不欲生,但可可也因此思想精神上完成了“成长”,因“叛逆期”而带来的烦恼与焦虑也随之烟消云散。

三

可在作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理想:“好铁要打钉,好男要当兵。我相信我就是能打钉的那块好铁,我就是像我爸爸那样的好男。我长大以后,也要参军入伍,当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至此,可可完成了自己的精神成长,也在情感上达成了对父母的谅解、理解与认同。曾有情在后记中这样写道:“《兵爸爸兵妈妈》以双军人家庭的孩子——孙可可的故事为主线,讲述儿童视角下的军旅生活,记录军旅环境中的儿童成长,通过一个孩子曲折复杂的心路历程,引领读者和这个孩子一起,逐渐认识和理解军人的使命担当与牺牲奉献。”小说清晰且生动地达成了作家预设的写作意图。

事实上,儿童小说写作对于成熟的作家而言,也是有难度的。这种难度在于作家需要寻找到真正的儿童视角,写出具有童年生命质感的文字。儿童视角往往意味着成人理性和经验的疏离。儿童文学的写作需要从儿童的心理和情感出发感知外部世界,而儿童文学写作中又始终隐藏着成人视角。成人和儿童两大主体的对话交流能够有效扩展作品的思想和情感容量。作家如何通过自我的阅历和情感体验,形成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影响与扩展,是儿童文学写作的要义。

人们不必担心青少年读者的阅读能力,担心他们无法理解作家的思想与小说的意旨。即便他们一时不能理解和读不懂也不算问题,能记住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或者小说中的人物和故事足够动人,让他们受到感染就足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兵爸爸兵妈妈》中,作家曾有情尽可能让笔下的故事浸润着成人对童年生命与成长的关怀,充分观照儿童内心的自由、愉悦、想象,探寻到儿童文学本真的形态与面相。

创作心语

耕耘人文,探寻崇高

2023年7月中旬,我受邀参加东山东山岛保卫战胜利70周年研讨会。一位作家朋友说,他多年前对这场战斗的书写中,对地方党组织、政府、群众的支援作用着墨不多,所幸《谷文昌:只为百姓梦圆》(中国青年出版社,2021年11月)写出了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战斗中发挥的作用。世人只知“双百人物”谷文昌是建设东山的功臣,却不太了解他首先是守护东山的英雄。他在大敌当前临危不惧,与守岛团长涂梅耀坚守不撤,以实际行动坚定了军民抗敌到底的信念。

斯人已故40余载。谷文昌留给后人的,远不止一座他主持建立的“东山战斗纪念馆”,也不止一个植树造林、治理风沙后宛若仙境的旅游海岛。一个有着高尚精神品质的人,总有不同作者来为其树碑立传。建党百年之际,人民英雄的书写更是繁花似锦,也因此促成了我的创作。

中国青年出版社与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联合发起、组织实施“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出版工程,请我撰写谷文昌。该文库以中国共产党创建以来的著名英雄为主要写作对象,旨在重温民族复兴英雄史,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提供优秀精神食粮。接到邀请之初,我有点犹豫。谷文昌已有多人写过,我还能创新什么?创作时间也吃紧。看了发来的方案,才心有所动:第一辑的书写对象中,有李大钊、瞿秋白、方志敏、杨靖宇等革命历史人物,而且作者阵容强大。其创作要求别具一格,以纪念设施为依托,以人物、故事为主体,以精神传承为旨归,激活历史记忆,面向广大青少年、部队官兵等群体讲述英雄故事,具体写作方式方法不作统一要求——这倒激发人跃跃欲试,文无定法,空间无限。

出版社找我去的那年,正值谷文昌逝世40周年。想到他逝世以来,从魂归东山、群众捐资塑像,到福建省委批准为其树碑、号召学习其精神,足见他穿越时空的精神感召力量。书写其人其事,对身兼党史研究宣传与文学创作职责、志于为英雄立传的我来说,本应义不容辞。并且,此前我在创作叶飞、项南、江一真等人传记时,在大量采访和查档中也无意间涉及到不少关于谷文昌的内容;我还采访过包括谷文昌妻子在内的第一批知情者。

谷文昌带给我的两大震撼一直萦绕脑海。一是当年采访其妻子史英萍时,看到了他留下的珍贵手迹“不带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他用一生忠诚地履行了自己的座右铭。二是他离世后这些年,东山人民逢年过节依旧是“先祭谷公,后拜祖宗”。

接下任务后,我的书写既忠于史实,又表现于文学之中,把人物放到历史现场、结合相关纪念设施来写,严谨运用史料,激活历史记忆,在抚今忆昔中由此及彼,由己及人,努力做到“人中有物,物中见人”,对谷文昌这位共产党人百折不挠为百姓造福的奋斗历程及历史经验进行深度导读。在文本技法上,我以纪实风格大散文书写,每个章节都可单独成篇,通过“我”的视角和讲述,把读者带入历史现场,注重故事的感染力和精神的传承。

虔诚书写高尚的灵魂

■钟兆云

我也向茅盾文学奖获得者、写过中篇报告文学《渔家傲》宣传谷文昌的作家雷达请教。如果说谷文昌事迹有三个主要支撑点——给“兵灾家属”以政治生命、带领全县人民将荒岛变成海上绿洲、为官清廉,在作家雷达看来,尤以第一项最了不起,独一无二。因为绿化造林和为官清廉是别人、别处也可能做到的,并且也不乏范例。唯有给被国民党抓去做壮丁的人们的家属定名为“兵灾家属”这一项,是特殊历史时期对党的统一战线思想和政策实事求是地运用。采访、讲述谷文昌30多年的《福建日报》原副总编辑张红则告诉我:“每一次走近谷文昌,都令我的灵魂得到一次净化,人格得到一次升华。”

我就这样走近谷文昌,与他一次次在时空中相遇并交流。一位哲人说过:“能够激发一颗灵魂的高贵、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坚定的理想信念,正是谷文昌克服艰难险阻,带领干部群众干出一番伟业的根基。人不能决定生命的长度,但可以增加生命的厚度,而生命的厚度就在于创造比生命本身更为久远的东西。谷文昌也因此成了“最美奋斗者”。书写谷文昌成了我虔诚的使命。在采访、感受和创作中,我切实感到,谷文昌并非是一个过去式的人物,也并非一劳永逸就能把他的故事讲完的人物。新时代依旧呼唤谷文昌“一心一意为人民”的公仆精神和英雄主义,依旧需要千千万万个谷文昌。

这份创作探究了平凡之人练成“非常之人”的道理。与笔下既往英雄人物传记一样,写作谷文昌,我心有感情、眼有感触、笔有感动。作品能在读者中引起反响,读者能够从谷文昌身上获得顽强的精神力量和坚定的信念支持,更多是真人真事的魅力、时代的呼唤,以及人们从中呼吸到的人间烟火气。

红土地上写春秋

■梁路峰

散文的精髓在于“真情”,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没有现实依据,随意虚构;情,就是要以情动人,写出打动人心的力量。作者笔下的“真”,是对现实生活的如实描摹;其中的“情”,是对革命先辈的感怀和平凡生活带来的感动。

作品在生动的细节刻画中有感而发、以情感人,其中既有对慷慨大义的赞颂,也有对人间亲情温情的抒写。在《卢家大宅院》中,作者形象地刻画出了大宅院里爷爷卢成儒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人物形象。1940年秋冬时节,日寇占据赣州镇。一个寒冷的冬日,日寇冲进卢家大宅院,手上明晃晃的刺刀在阳光下反射着寒光。在卢家大宅院的上房大客厅里,日寇说着半阴半阳的中国话,要求爷爷担任敌伪镇长。面对日寇的刺刀,爷爷没有退缩,而是坚定地说:“我只会做生意,不会当官。”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一出,震惊四座。此处的描写与结尾处情感的升华遥相呼应,意蕴深长:“我仿佛听到了从遥远的天际飘来了爷爷当年那铿锵有力的话语:不要怕,天塌不下来!”

在《父爱如歌》中,作者以回忆往事的书写,将可敬可爱的父亲形象刻画出来。尤其是景物、动作描写生动形象,在日常生活中展现出诗化的意境之美,渲染了父女情深的家庭生活氛围,让读者也沉浸在文字描摹的温馨世界。“午后,阳光洒在天井里,天气融融,整个大院里安静、温馨。我挨着父亲坐在天井旁的小板凳上,一只小花猫也跟着躺在有阳光的空地上,懒洋洋地翻滚着,伸着懒腰。我喜欢眯着眼睛仰望天井上空,碧蓝澄澈,云在长方格里游动,偶尔有一只飞鸟刹那间飞过,那情景使我

陶醉在天井之下的书香园里,如痴如醉。父亲手里拿着《西游记》,给我讲述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红孩儿的故事,他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微笑,一会儿声音爽朗,一会儿低语呢喃,一会儿站起,一会儿拍腿。故事在父亲的演绎下,出神入化……”当记忆中一个个美好的场景通过文字流淌在笔端,浓郁的亲情便心底生根发芽。

卢文芳的散文以充满画面感的描写为读者展开想象与写实的画卷。在《桃源梯田美如画》中,形诸于文字的乡间美景和田园生活令读者心驰神往。“桃源梯田有了人家便有了烟火气,一缕乡愁从心底慢慢升腾。老屋的女主人邀请我留下吃饭,我欣然答应。不一会儿,农家小菜摆满一桌,小竹笋炒酸菜,竹笋的清香扑鼻;屋旁菜园里现摘的蒜头炒腊肉,腊味飘香;屋后新采的苦苣菜素炒,苦有回甘;田畴里嬉戏的肥鸭做成的客家白切鸭,外加一碗由花椒油、醋、辣椒末和葱姜蒜末调制的蘸料,麻辣辣辣、酸咸可口,美味二字不足以形容;还有霉豆腐、辣椒酱、浸坛、油炸果蔬……山里的人们最会编织生活,老屋里有舌尖上的中国客家美食,我迫不及待大快朵颐。”这是人间的烟火日常,也是对客人美好生活的礼赞。此外,作品对历史的追溯,也让读者感慨客家先民在经历千辛万苦之后创造梯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壮举。

作品收录的散文,多以形象来说话,将思想情感寓于具体的形象中。作品在汨汨潺潺的抒情和叙述中,寥寥数字就自然流畅地刻画出生动形象和感人场景,描绘出红土地上的春秋代序和红色情怀,营造出悠远平和的意境。



《红土春秋》(群众出版社,2022年12月)是卢文芳创作的一部描写井冈山革命红色记忆、抒发生活感悟的散文作品集。作者出生在井冈山下的遂川县,她熟悉井冈山的山水草木、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她用真诚书写红土地上的故事,以真情讲述家乡的人和事,浓烈的情感蕴含其中。

作者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曾在遂川县城罗汉寺街张家大院和康家大院度过。罗汉寺街是一条百年老街,也是工农红军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自幼生长浸润在这片红土地上,厚植了作者心中的红色情结,也滋养了作者下笔着墨的基调。那一条古老的街巷,有她朝夕相处的乡邻,有她生活的轨迹。对故土的留恋和热爱,让作者不禁用心细细观察并书写脚下的沙石泥土和身旁的青砖黛瓦。于是,她写革命年代的历史故事,写老街的岁月更迭。一篇篇氤氲着乡土与红色气息的散文,凝聚了早已融入她血脉的红色情结和家园深情,书写出生动感人的红色往事和烟火人间。

文艺评论



栖霞山(木板套色)

张新予作

长征

第5871期